

李润和 著

中韩近代史学 比较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K09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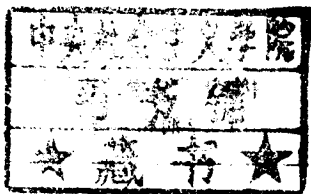
90440



200413463

中韩近代史学 比较研究

李润和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8 号

DQA/07

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

李润和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管庄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9.5 印张 234 千字

印数 00001—1000

1994 年 2 月第一版 1994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525-1/K·57 定价: 8.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中韩两国，在古代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在近代有着一段类似的历史遭遇，值得中韩人民回顾与反思。中韩的历史学者对这种客观的历史十分注意，他们怀着“述往思来”的深情，或从不同的侧面，或由不同的角度，予以追述，加以评论，这对史学史工作者提出了一个课题：中韩史学的异同如何？李润和教授有感於此，早就撰写了关于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的专著，使这个课题的研究，有了良好的开端，对史学的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将会为中韩的历史发展与文化交流起着促进作用。今趁李氏大著付梓之机，我再说两句：

白山黄海山川绿，
往古现今历史情。
东西可架桥，
彼此证汗青。

施 丁

一九九三年九月九日于北京

目次

序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传统史学之成立与发展	(5)
第一节 传统的历史观之成立与发展	(5)
第二节 传统史学体裁之成立与发展	(10)
第三节 韩国之中国史学输入与影响	(13)
第三章 近代史学之前驱——明末清初经世史学与 朝鲜后期实学派史学	(21)
第一节 时代背景与思想动向	(21)
第二节 西学之传入与影响	(25)
一、西学之传入背景及其特征	(25)
二、对西学之反应	(28)
第三节 现实的历史认识之扩大	(32)
一、经史观念之特征	(34)
二、现实的、进步的历史认识之展开	(37)
第四节 民族意识之扩大	(43)
一、明末清初对正统与华夷观念的重新认识	(44)
二、朝鲜后期对华夷观念的克服与正统论之展开	(50)
第五节 科学的历史认识之扩大	(57)
第四章 近代史学的萌芽	(68)
第一节 危机意识与民族的自觉	(68)
一、中国之危机意识的产生及其应对的特征	(69)
二、韩国之危机意识的产生及其应对的特征	(74)

第二节 爱国启蒙史学的兴起	(81)
第三节 进化论之传入与进化史观的成立	(92)
第五章 近代史学的成立	(109)
第一节 传统史学之批判与继承	(109)
一、中国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与继承	(110)
二、韩国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与继承	(122)
第二节 新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之成立	(128)
一、梁启超、章太炎之新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特征	(129)
二、申采浩、朴殷植之民族主义史学的特征	(138)
第三节 西洋史学之输入与影响	(149)
一、以方法论为中心的西洋史学输入中国及其发展	(149)
二、韩国之间接式输入西洋史学及其发展	(156)
第四节 梁启超与申采浩史学之比较	(160)
一、思想的多变	(160)
二、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168)
三、对正统论的态度	(170)
四、对史学方法论之认识	(172)
第六章 近代史学之发展	(176)
第一节 派别之成立与发展	(176)
一、中国之派别的成立及其发展	(177)
二、韩国之派别的成立及其发展	(194)
三、两国派别的特征比较	(205)
第二节 对古代史认识之转变	(206)
一、中国之疑古倾向与古史辨运动	(207)
二、韩国之民族的、反殖民史论的古代史认识	(217)
三、两国对古代史认识之相异点	(224)
第三节 唯物史观的引进与发展	(225)

一、中国之唯物史观的引进与发展·····	(226)
二、韩国之唯物史观的引进与发展·····	(243)
三、两国的唯物史观之特征比较·····	(249)
第七章 结论 ·····	(251)
参考书目 ·····	(264)
后 记 ·····	(291)

第一章 绪 论

由历史观之，中韩两国在政治、文化等方面有着密切关系，而且自上古以来一直发展迄今。若说十九世纪以前之中韩两国的传统关系，一直是由中国政治及文化方面为主导，亦非言过其实。

秦汉帝国成立以后以华北地区为中心所形成的中国文化，以强盛的国势为基础，首次对周边国家产生广泛影响力。接着由唐朝在政治上的开放与其所积存的文化活力而更加发达，不仅深深地影响周边国家之政治、文化，同时，亦形成共同的文化观念。因此，有人提出要以中国为中心之世界秩序来解释自隋唐以来的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关系。^①

在传统的中韩关系中，中国以优势的政治与文化，使得双方发展至朝贡关系。在此关系下，韩国对中国产生事大的观念，可说是很自然的现象。在朝贡关系下，韩国所展开的文化输入，却一直是部分的、有限的。韩国仅能靠中国满足其对学术与文化全盘的欲求。同时，在吸收中国以外的文化时，也是透过中国，输入已中国化的文物。例如佛教与西学的输入，就是最好的例子。韩国对有关中国周边国家之知识也是透过中国正史的四夷传。至明清时期中韩交流更形广泛。^②此时韩国对有关其他国家的知识，绝大部分仍靠使臣输入的中国书本中所获得。^③

① 全海宗：〈中国与韩国〉，《韩中关系史研究》（汉城，一潮阁，1981年1月），页9至24。

② 高柄翊：〈李朝人之外国观〉，《东亚史之传统》（汉城，一潮阁，1967年2月），页60至63。

③ 全海宗：〈韩中朝贡关系概观〉，《韩中关系史研究》，页26至58。

传统的朝贡关系到了十九世纪后半，韩国被强迫开放，与外国签订条约后开始动摇。至清日战争（1894——1895），随着清朝的败北中韩朝贡关系亦随之停止。同时，借由朝贡关系所展开的传统文化交流之特征也就不得不跟着改变了。

上述特征并非单独出现在中韩关系，而是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关系上的普遍现象。因此，东亚文化圈国家文化特性，可从其接受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以及调和中国文化而确认其独创性。^①韩国的传统学术文化，直到十九世纪以前的发展，有如上述。然而随着封建的中世体制逐渐崩溃、西风东渐以在帝国主义压力加重的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为因就时代危机之自我意识的增强，而成立了文化的独创性。

本文所探讨的史学则已反映了上述中韩关系之特征。十八世纪以前的韩国传统史学，一直深受中国儒家史学的影响。而且有关史观与历史编纂体例，亦绝大部分承自中国史学。^②时至十八世纪以后，随着实学思想及新史观的发展，韩国史学开始转变。但是，此时期的转变也只不过是批判不符现实的中国儒家价值观，而并非全盘否定整个中国史学之史观或体例。所以中国史学之影响力仍然存在。这种情况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改变。

中韩两国在近代史学的发展与思想上的变化，有几点相类似。中国自道咸年间（1821—1861）以后，封建社会体制之矛盾逐渐扩大，外力压迫亦日益加重而产生忧患意识，思想亦不得不随着

① 1965年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办之有关中国的世界秩序研讨会，中国的对外关系之类型分类如下：一、军事的支配；二、行政的支配；三、文化的影响；四、宗教的影响；五、物质的利害关系；六、以夷制夷策。（全海宗，〈关于中国的世界秩序之学术会议报告〉，《历史学报》第29辑（汉城，1965年12月），页161至165。）

② 朱云影：〈中国史学对于日韩越的影响〉，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二）（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10月）页1055至1064。

时代而变化。因此，也就开始怀疑宋明理学是否能胜任应变当时危机。这种看法在明末清初甚嚣尘上。若以明末清初的怀疑是借批判宋明理学之空拙性，试图恢复儒家原所具有的经世思想，则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可说是由认知国内外之严重危机，试图自觉以救亡图存。因此，今文经学的公羊思想再次兴起，并且为了救亡图存而发展至有发展性的历史观念，同时又接受外来的进化论。因此，在此时代背景下史学能够具备崭新的面貌也是理所当然之事，同时在公羊学与进化论思想之刺激下，也形成了所谓的新史学。

同样地，在韩国也展开了与中国类似的情形。自十八世纪以后，尽管实学有所发展，但因政治及社会的矛盾已达难以解决之地步，这种情况又随着当时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尖锐对立而更加恶化，使得韩国朝野充满危机意识。为了克服此危机，开始形成以实学作为思想根基并主以输入西学之开化思想，以及以程朱学价值观为基础之卫正斥邪思想，同时，具强烈民族主义特征之东学思想等也以新时代思想之姿态成立。在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行为更加严重，韩国终于在1910被日本当作殖民地统治。因此，所有思想的力量俱都集中于如何摆脱日帝之殖民统治以及为争取独立而呈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同时，在史学亦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之新史学。

中韩两国在近代史之发展过程与其所对应的思想变化过程中，尽管在大脉络上有许多共同点，但经过更具体的观察时，不难再次确认中韩两国具有相当不同的历史体验。例如中国，是经过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借着为因应变局所接触的各种形态的思想而成立了近代史学。反观韩国，既无政治性革命，亦无文化性运动之体验而直接沦落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因而韩国没有机会接触到其他各种形态的思想。因此，在中韩两国近代史学的成立与发展上，均含呈现出上述的特征。本文之主要论点亦在于此。

一般而言，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是以比较历

史的相似性为前提，也就是指比较某一特定史实，或是指比较构成史实背景之思想。比较方法有两种。^①其一，对因时间或空间相距太远，致无法利用相互间的影响或共同的起源来说明其类似现象者，所使用的方法。其二，则是对属同一时代且邻接之社会，亦即是在不断相互影响及发展中，因其邻近又属同时代，同样受大环境的支配，因而至少在部分上具有共同起源之各社会所使用的方法。后者是指邻接在一起且属于同一时代之各社会，因具相同的渊源，以及相互间的影响而会具有相似的特征，在此就是指如中韩两国形成相似文化圈之情形，大体上，属同一文化圈的地区，因其社会及文化上的相似而发生类似的现象。但比较历史的相似性时，要找出相似的现象，同时亦应注重究明其共同点与相似之原因。换句话说，是要了解问题之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观察在何种背景下所发生的。^②

比较史学的研究要点在于究明史学思想、理论，以及方法上的异同，同时也在于考察史学与其他思想、社会与人民的关系。因此比较史学是可以比较同一国家的史学或史学倾向，亦可与其他国家的史家或史学作比较。但无论如何，在比较时须先摒除成见，在同一水平上作比较。如此才能达到比较的目的，同时借着比较而使史学更加丰富。亦可借以了解史学上的异同；以及因了解此异同的背景而能够找出综合性的方法。如达到上述境界后，才能创造出比较史学的最终目标。^③ 本文之作，则完全本于上述之精神。

① 梁秉祐：《历史之方法》（汉城，民音社，1988年2月），页132至137。

② 全海宗：《历史研究、比较、比较史学》，《东亚史之比较研究》（汉城，一潮阁，1987年3月），页1。

③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北，三民书局，1983年12月6版），页339至242。

第二章 传统史学之成立与发展

第一节 传统的历史观之成立与发展

在中国所有学术当中，史学占了相当重要部分，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史学不仅仅是因保存有丰富的历史记录，且可透过丰富的历史记录，开发其所蕴含独特的精神。由于这点，史学在中国可说是一个能够了解全体中国文化之重要的基准。

那么，在这丰富的历史记录当中，到底存有何种精神呢？要回答此问题之前，先要了解中国史学中所存有的历史观念（历史认识）。尽管中国保存有许多历史记录，却非常缺乏以体系的表现其理论性的观念。因此为了解中国史学内在的历史观，则需要把分散、潜在于各历史记录的精神找出来，再予以整理外别无他法。

大体上，中国史学之研究者大多以“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来解释史学的初期形态。^①但不管怎样，现在可说史学已透过左史与右史而成立了。对“史”字的解释虽有许多说法，然而上古时代的史学与史官有密切关联是无可置疑的。^②在上古时代的南史与董狐等被称为良史以来，史开始重视独立的自我观念，而确立了中国史学据事直书的传统，透过这些实践而成了以后良史最重要的基准。这种据事直书的精神，以后则成为以儒家价值观为中

① 关于古代史官及其职务，参见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4月），页9至15。

② 关于此问题，参见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2月2版），页1至109之诸论文。

心之传统史学的重要标准，也在提高中国史学之客观性上扮演重大角色。然而并非据事直书就是良史之唯一标准。而是当该事实存有强调内在精神时，亦即具有所谓的“义”时才能成为真正的良史。

强调史学初步的自我观念可说是从孔子开始的，而他欲将史学提升为一定程度之思想体系。亦即将史学作为实现一种社会思想之实践性的学问。孔子著《春秋》也终究是要为实践此理想。^①孟子或司马迁也都认为《春秋》并非单纯的作为历史之记录，而是具有独特经世的性质。^②因此后来的史家则重视《春秋》之最终目的，即经世思想的体现。

透过《春秋》来表现经世意识之最具代表性的方法，就是借着微言大义来正名分，借著褒贬来劝善惩恶之价值的实现。当然，微言大义的表现与褒贬的强调似乎跟〈据事直书，是非自见〉之原则有所出入，但这就是将中国史学与西洋史学可为区别之独自的特征。^③也就因此而中国史学才能坚持客观的历史解释方法，同时亦强调史学之经世的、借鉴的角色。

但尽管有着上述的观念，然而史学一直被认为是经学的延伸而已，这种观念尤其到宋代程朱学发展之后更为加深，例如司马光批判南朝宋文帝所立的玄、史、文、儒四学而说到：

《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馀事；至于老庄虚

① 束世澄：〈孔子《春秋》〉，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页31至48。

② 参见吕绍纲：〈孟子论《春秋》〉，《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北京，1987年3月），页42至46。及《史记》（台北，鼎文书局，1984年6月3版），卷130，太史公自序，页3297：“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③ 杜维运：〈经世思想与中国史学〉，《史学论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7年4月），页65。

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①

只认史学为儒的一端，却不承认史学有独立的观念与价值体系。亦即史学只是儒家的思想一种表现的形式而已。司马光对史学的解释是将史学以明天道、定人伦的大纲来解释为前提所产生者，而这种经史合一的思想对了解传统历史观是很重要的。

中国传统历史观，与六经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周知的事实。因六经所追求的道或理也是史学所凭为依据的，因此在事实上要明确区分经学与史学是相当困难的。虽然经学偏重于理，而史学则偏重于事，但实际上经学中的理是在历史的事实当中所遇到的，而历史的事实其结果亦是归依于经学所追求的理上，故经学与史学亦不予以区分而当成一体。这种倾向虽将经学和史学以不同比重来解释，但透过王阳明的“五经皆史”或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而表现得相当清楚。总之，这些议论肇始于经学所追求实现经世之价值，被史学以实践性的追求所取代。然而不管怎样，经史合一、经史一体的观念背后，则特别强调史学所追求的实践性价值，由此点，可再次确认中国史学具有的经世之特征的重要性。^②

其次，除了上述史学之机能与角色外，观察历史根本上之问题，是如何发展变化等等。大体上，上古殷商时代以前人们对宇宙本体与一切现象的解释是仅能依靠天意来做解释。到了周代，天意仍被肯定，但开始自觉人事的重要。尽管有这些自觉，但因时代认知上的界限而影响到历史观念之天命的比重，一直到汉代仍为相当重要的基础。例如董仲舒等儒家的天人感应说法，或阴阳家、谶纬图说等的流行，就是受天命史观的影响而反映出神秘主义的色彩。这种天人感应的观念被同时代的王充与唐代的刘知几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台北，中新书局，1976年11月）卷123，宋纪五，文帝元嘉15年12月条，页3868至3869。

② 钱穆：《经学与史学》，《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页120至137。

严加批判。^①虽然到后来仍残存着这种靠天命式的历史观念，却没有盲目的相信宇宙现象是由某种神意所展开，或是宇宙间有种力量可使历史如像操作机械一样的来运转等。因此开始有了历史是要靠圣人或君主的努力来发展的观念，亦即已达到了强调要靠人事的努力来发展历史之观念的境地。^②

再来是观察对于构成历史观主要本质的历史，是如何进行等有关观念上的特征。对于此问题的见解虽有很多，但大体上可区分为进步的历史观、倒退的历史观、以及循环的历史观。所谓进步的历史观是指立于历史不断进步之观点而言，《韩非子·五蠹》篇为典型的代表。其基本立论是以生产工具的进步、生产能力的提高、生活能力的增强、生活水平提升的观点来区分时代，同时以进步的观点来说明社会发展的过程。^③这种观念并非从《韩非子》才开始出现的，早在《周易·序卦》中及《孟子》中已显示很清楚。^④到后来立于程朱学价值观的儒家史学也就是利用此观念，才能有效地指出盲目相信历史发展，是由圣人或圣王来主导之观念上的弊端。因此这种观念是强调“时移世异”、“随时之义”，主张要顺应时代状况之改革。而这种观念成为后来近代史学成立与发展重要动力则不在话下。然而由司马迁、刘知几、郑樵、黄宗羲、王夫之等逐渐发展的这种观念，到了近代，因为无法形成具体的理论体系，所以，相对于西洋史学理论，则此方面的理论显得相当脆弱。

① 符定波：〈《史通》与《论衡》比较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页161至163。

② 郑敬高：〈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初探〉，《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88年第3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88年3月），页16。

③ 张纯、王晓波：《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年9月），页89至98。

④ 薛莹：〈《易·序卦》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论述〉，《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页22。

循环的历史观则有不同的具体形态。即认为“天地有常位，历运有常数”而承认运行天地的常数，而且历史亦由此常数来进行，因此这跟天命史观在本质上就没多大差别。^① 这种观念亦部分出现在孟子的一治一乱说、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董仲舒的三统说、以何休为代表之三世说等。这些循环历史观共同的特征是为历史是循环的、历史的演变是循环的，可是循环的演变因未能跳出变之中，而有不变者之存在的界限，因此，此观念跟发展性的历史观念却有些距离，同时亦可指出此观念虽承认“变”但却疏忽其变质，虽远离神秘主义色彩却流于简单化及公式化。然而这观念的发达，其重要意义在于诱使中国古代史家在研究历史时，不以个别的事实来解释，而以整体解释。

所谓倒退的历史观则与儒家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在儒家思想体系上有严重的复古倾向，由此可知其古代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也就是说，认为儒家的至上价值（仁、义、礼等）是由已往过去的圣贤所体现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理想并非寄望于未来，而是以现在的基础上，从所〈意定的过去〉中之实际存在而得到的。^② 在此的实际存在是记录有圣人言行之经典上的先例而言。在此情况下所谓的过去是含有一定程度的价值。亦即也可能成为解决现在问题之发展性历史观念的产物。但真正的复古论是要否定现实，而且是意味复归于以往时间上，以及实际存在的过去。然而实际存在的过去，亦只不过是选择性的在古代中采取某一特定部分而已。所采取的也就是圣人所出现的时代。故在此情况下，古代是过去所要寄望的未来。^③ 正如未来在本质上是超时间性观念的产物，则过去亦同

① 罗光：〈中国的历史观〉，《史学评论》第六期（台北，1983年9月），页169。

② 闵斗基：〈传统思想与现代中国之理解〉，《中国近代史论》（汉城，知识产业社，1976年8月），页106。

③ 闵斗基：〈儒教思想之历史意识〉，《中国近代史论》，页120至121。

未来，无所差异。这就是所以让儒家能够以过去作为改革的原理之理由。然而在前面已曾提过已往历史的以圣人主体，运行历史之原动力也在于圣人身上，故为改革一般人而不是圣人的社会时却又不得不借重于假托圣人。这正跟西洋中世史学靠神的变理来发展之观念有类似之处。

除了上述有关历史发展的三种历史观外，在分析古代具体的历史问题中，所蕴含的理论特色，也是了解中国史学相当重要的基准。正如正统论、治乱论、古今论、势理论、华夷论等。本文在第三章以下，会以具体的问题加以分析。

第二节 传统史学体裁之成立与发展

有关史学家如何了解历史的问题，则直接关系到如何把自己所了解的历史，以本来的面貌客观化，此关涉到如何记录历史的问题。而且随着认知历史事实方式之不同而史家所记录的方法亦不同。西洋史家批评中国史学仅为事实的排列，且根本未就史实的因果关系加以叙述或分析。这种评语难有其客观性。^①虽然中国史书皆是一个事件接着再叙述另一个事件的形态，故在事件与事件之间似乎没有联系性，而且似乎排列一些最没用的事实。但实际上，中国史书是经过一番筛检，将检出的资料按照一定原则，整理出来的事实。至于如何组合所选择出来的资料，似乎属于体裁方面的问题，但实际上包含相当多的理由。^②中国史书编纂的传统相当悠久，且历经数千年，不断地持续着。例如清代所编成的《四书全书总目》，其史部中所著录的史书多达二千一百七十四部，

① 杜维运：〈西方史家心目中的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8月），页267至283。

② 陈锦忠：〈中国传统史学工作的内涵与特质浅说〉，《东海大历史学报》第五期（台中，1982年12月），页46。